



黄蓓佳

“正月已经过去，空气中明显嗅到了早春的气味。野地里最先开放的是鲜黄色的迎春花，一簇簇，一条条，衬着大片枯干了一冬的土地，让人心情都跟着鲜活和明亮起来。迎春花一开，野蜂来了，白色的小粉蝶也来了，连鸟雀都欢欣鼓舞，嘤嘤嗡嗡了一世界的热闹。……”这是身处战乱年月里的少女黄橙子，走在放学路上，一边看着春天到来时野蜂飞舞的景色，一边想着自己喜欢的那首钢琴曲《野蜂飞舞》的一幕。

国破山河在。战争的梦魇里，依然生长和怒放蓬勃美丽的希望之花。《野蜂飞舞》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战火纷飞、逃难避寇的离乱年月，但作家并没有过多铺排和渲染战争带来的恐怖、灾难和绝望，而是把少女黄橙子和她的家人、同学、朋友，在黑暗年代里未曾泯灭的对生活的珍爱与信念、对国家的拯救与重生、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作为整个小说的主线。

一本讲述黑暗年代的故事，却充满了温暖和光亮。小说里始终贯穿着那首春意盎然的音乐名曲《野蜂飞舞》的旋律。它也是为那些火焰般年轻的生命而歌，也为了把被战争驱赶和蹂躏的人们，从黑暗的梦境中拯救出来。



彭学军

求雨，原本是在大旱季节，由成人主持的一场宗教仪式。在彭学军新作《男孩的雨》中，却完全颠覆了求雨的主题类型和意义模式，求雨演化成一场去崇高化的儿童游戏。小说没有因求雨的意义重大而神化两个儿童，也没有因他们没找到人工降雨的工作队而矮化他们的形象，而是始终围绕着一个本真的童心展开情节，抒写了一个跌宕起伏又童趣盎然的故事。

上马村的五龙亲身经历了大地龟裂、河流几乎干涸的大旱，亲眼目睹了巫师求雨的一次次失败。当老师说起必须借助人工降雨才能缓和旱情时，五龙犹如电石火花般灵光一现：为什么不找人工降雨的工作队？说干就干，儿童从来都是行动派。五龙在全村人



许诺晨

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恐怕并不仅仅作为历史存在着，而是与当代生活、当代精神塑造紧密相连。战争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与黑暗恐怕是任何别的事件所不能比拟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抗战为题的文学作品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慷慨悲歌，气势磅礴。当代中国作家不断搜寻那段悲壮的历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灵感和激情，以更理性的姿态、更宽阔的胸怀、更细致的史料挖掘、更娴熟的艺术表现，写出了一批有分量见精神的优秀作品。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面向儿童讲述这场惨烈的战争，如何在孩子对世界有限的理解、有限的生活圈内，书写这场战争，讲述一种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讲述一种对民族

“相伴短暂，离别漫长。整个天际，都是你飞过的自由。”

《野蜂飞舞》：为火焰般年轻的生命而歌

■徐鲁

《野蜂飞舞》，黄蓓佳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8月第1版，26.00元

故事里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朝气蓬勃的、如同榴花与火焰般美丽的生命，都如同上天赐予我们的天使与奇迹。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越是在苦难、艰辛和黑暗的年代，在这些年轻的生命身上，越是具有一种非凡的、奇迹般的乐观向上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饱受挫折，却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不断浴火重生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黄蓓佳是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作品里流淌着宽阔和温润的人道主义。她很少去写乌托邦式的幻想故事，数十年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几乎全部是在回应汉斯·安徒生的那句名言：“上帝笔下最精彩的童话故事，就是每个人的真实生活。”

《野蜂飞舞》的故事背景是宏大而开阔的，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全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家在尊重和善待祖国与民族的历史的前提下，同时又顾及儿童文学的特点，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作为一群少年主人公的成长环境，然后从小物件、小细节入手，层层生发，演绎出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人物命运，并且透过最小的细节描述，反映出大时代的特征，乃至整个时代和社会风貌。

战争开始了，为了给国家和民族保留下文化和教育的种子，国内的大学和中小学纷纷迁徙到内地

躲避战乱。当时，中国的许多家庭甚至都自愿离散，宁愿忍受亲人离别之痛，也要让正处在求学年龄的学子们追随学校和老师，接续他们艰辛的离乱和迁徙中的读书生涯。在战火燃烧的年代，国家、家庭、学校联手守护这一方净土。让一代孩子在恶劣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这也是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一个共识。

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就是这样一群生活在艰难时世的孩子。正如故事里的爸爸、一位深明大义又深爱着孩子们的大学教授，挥动着烟斗，给孩子们讲的那样：“中国还没有亡，还在抵抗。……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没有天堂我们要建造一个天堂，你们尽管读书、上课，享受你们的童年，把知识本领学到手。记住，一旦抗战胜利，重建中国是要靠你们的。”

战争剥夺和摧毁着这些如石榴花一样美丽的孩子们本应拥有的安宁、幸福与梦想，战争也在教育和锤炼着正在成长的孩子。

例如，当哥哥黄俊参加了童子军之后，在战时医院里帮忙，亲眼见到了一批批从前线抬回来的伤员，看到了医院里人间地狱一般的悲惨情景，每天回家都吃不下饭，还把自己关在房间哭过一场，这时候，“他赌咒发誓，长大十八岁就参军打仗去，不消灭日本鬼子决不踏进家门一步”。

橙子的姐姐书雅，参加了一个

战地服务团，一路跋涉到了贫困的陕南边境。回来后她以自己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告诉全家人，这一路走下来，才知道中国农民有多艰辛的离乱和迁徙中的读书生涯。在战火的生活中，她亲眼见到当地人老老小小伙着一床棉裤过冬，锅里揭开来只有清水煮野菜；医院的伤病员因为缺医少药而活活疼死……残酷的战争，唤醒了这位少女内心全部的激情和力量，最终她毅然选择投笔从戎，告别校园，跟着一起共产党员奔赴到西北抗日前线去了。

就连平时总是无忧无虑、顽皮得像野孩子一样的小妹妹黄橙子，也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和年复一年的警报声里，深切感受到了亡国之痛，懂得了“国破山河在”的道理：“躲警报的两年时光中，我们都已经长大，知道我们能够活着，有饭吃、有学上，是因为有无数士兵在为我们付出，在用他们的血肉替我们筑起一道长城。”

伴随着少女橙子在战乱中渐渐长大和成熟，还有一位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小哥哥沈天路的友谊。沈天路是爸爸收养在家里的一位好朋友的遗孤，他小小年纪，却历尽生活的磨难，心地善良而聪颖，从苦难的生活中学到了生存的智慧。战乱的年代，恰如酷热的季节，仿佛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让这个少年变得像成年人一样成熟。小说里写到天路为了让妈妈在冬天里保暖一些，虽然瘦小，

却悄悄出去给人做了二十多天小工，挣回了一点钱，终于给娘赎回那件因迫不得已而抵给马家婶婶的皮坎肩，这个情节读来令人眼睛湿润。沈天路也像亲哥哥一样呵护和关爱着一天天长大的黄橙子。少年之间懵懂的、单纯的爱与友谊之花，也在悄悄绽放。他期待她能把手曲《野蜂飞舞》弹奏好，鼓励她说：总有一天，小野蜂会在这排琴键上飞起来的。“总有一天……”，橙子把他的话语牢牢地记在了心上。

故事的结局是，国难当头之际，哥哥克俊毅然加入了中国远征军的行列，牺牲在缅甸战场上；姐姐书雅奔赴了西北抗日战场，却没能活到胜利的一天；沈天路也成为自己仰慕已久的赫赫有名的“飞虎队”的一员，最终在激烈的空战中驾驶战机与敌机同归于尽。橙子也一直记得他说过话：“橙子，等我回家，你给我弹个琴吧，就弹你说的那个，野蜂在飞……”

在战乱中成长起来一代儿女芳华，最终都为挽救垂危的祖国母亲而洒血疆场，让青春之花绽放在了血与火的原野上。只剩下了故事的讲述者、少女黄橙子，她弹奏着天路哥哥生前最喜欢的乐曲《野蜂飞舞》，在对那个像夏天的石榴树一样青翠的男孩的怀念中，一直活到了今天的和平年月。

她是艰难时世的见证者，也是战争岁月里的幸存者。无论是大

哥、大姐，还是天路哥哥，还有他的父母亲、陶伯伯……他们都是走过了她的生命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他们曾经一起走过，无奈他们总有离她而去的一天。而当历尽沧桑之后，回首童年，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包括今天的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战争年代的童年回忆，只要我们心怀感恩，心存敬畏，那一切美与真的、爱与善的，其实都是能够超越艰苦的生活道路而留存下来的。就像主人公老年时所言：“他们都死得其所，像烟花绽放放在天空，优美而绚烂。我只有自豪。七十多年过去，我已经老成了这个样子，他们却永远年轻，年轻到笑声里带着露水。”

《野蜂飞舞》是一本优美的、诗意盎然的少年小说。“相伴短暂，离别漫长。整个天际，都是你飞过的自由。”作者写在小说故事之前的这两行献辞，也奠定了整个小说诗意的基调。故事情节叙述间隙里，也充满了精确而精彩的、诗意的描写片段。比如，“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星空。那么多的星星，排山倒海一样，一声吆喝就会从天上哗啦啦地倾斜下来一样，那么的密，那么的庄严又热切……”这样的描写，也让今天的读者一再感受到，虽然残酷的战争曾经是主人公们的童年的一部分，但是孩子们并没有生活在阴影和绝望里，而是依然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行走在爱与美的光彩里。

按五龙和树生的理解：成人宅基地大动干戈就是在课桌上画了一条分界线，有一方越界了，怎么办呢？用胳膊儿捅捅就是了。

《男孩的雨》：一场关于“求雨”的成长游戏

■张梅

《男孩的雨》，彭学军著，明天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18.00元

还在沉睡之际就上路求雨了。

他和路上巧遇的下马村的树生分别站在自家立场上进行争执，饥渴之际他和树生合作偷西瓜，看电影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求雨的使命，并且还在人家运输桔子的车里大快朵颐，然后沉沉睡去时更是忘了他们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两个小朋友最初求雨的壮志之所以没有演化成生硬的教化典范，是因为他们的求雨从来都是一场游戏。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本质。他们在游戏中倾情投入，乐此不疲。五龙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孩子让人工降雨工作队来自己村降雨是否合乎程序？其实五龙完全可以告诉村长，然后村长打电话或派人派车去找工作队。这样的儿童行为恰恰源于一种游戏的心态。五龙和路上结识的树生都互相打着埋伏，“假借”走亲戚，不告诉对方此行的目

的。儿童的“假借”行为正是游戏虚拟结构、幻想功能的具体体现。

细察两个小朋友的求雨过程，就是游戏精神的完美呈现。比如他们在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时，毫无心理负担地放弃了求雨。五龙和树生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路途的遥远和行程的艰难，也没意识到自己的不自量力。游戏关注的是愿望的满足，游戏的满足感和力量感来自于过程。五龙和树生经历了一天的求雨历险，情感已经得到释放和满足。因而他们最后在观影中如痴如醉，根本不去考虑“接下来”会怎样，“好像他们翻山越岭走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来这里看露天电影的”。

五龙和树生的求雨故事蕴含着儿童文学中“离家——历险——归来”的经典叙事模式。这种游戏模式有很强的象征性。20世纪最伟大的神话学家约瑟夫·

坎贝尔曾把人的心灵成长隐喻为英雄的历险。他发现，尽管各民族神话中的英雄面貌和冒险经历各不相同，但英雄的历险总是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秘的领域中，遭遇各种难以置信的超自然体，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是友爱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儿童文学与神话的亲缘性，使其成长叙事也常包含离家——历险——归来这样一种原型结构。

少年的“离家”常被称为成长的经典姿态。在这场命名为求雨的成长预演中，五龙和树生注定要经历种种磨难。第一重考验是友爱。树生主动地与五龙分享珍贵的水和食物等。但友情也遭遇危机。原来两家是仇家，在天旱之前

的械斗中，两个人的哥哥都被对方打伤。两个小仇人相见，并没有分外眼红。因为按五龙和树生的理解：成人宅基地大动干戈就是在课桌上画了一条分界线，有一方越界了，怎么办呢？用胳膊儿捅捅就是了。大人们也是这么办的，可“捅”得太厉害了。显然，两家不共戴天的仇恨被还原成小朋友间的打打闹闹的日常。于是两人斗气之后又嘻嘻哈哈地嘲弄起自家哥哥伤好后的滑稽表现。他们又重新结为患难与共的小盟友了，收获了友情。第二重考验是勇气，两人面对毒蛇冷静应对、默契配合，最后成功逃脱。两人还要面对暮色四合山中闪烁的鬼火。两人用唱歌、用闷头快跑把恐惧甩到了后面。他们变得勇敢。第三重考验是责任。两人在饥渴难耐下偷吃了路边的西瓜。西瓜主人让身无分文的两人赔钱，两人为了抵债主

动担水把西瓜地都浇遍，五龙还贡献出自己心爱的书包。继续走上求雨之路后，两人商量找到工作队让他们先到西瓜地这儿降雨。他们学会了担当。此外，还有酷热、饥渴和疲惫等等来自身体的重重考验。

五龙和树生在“离家”历险中遭遇的一连串的事件既事出意外又合乎情理，情节巧妙又真实，结构紧凑不局促，而且完全吻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因而，求雨对五龙和树生而言，是一出儿童游戏，又绝非仅仅是一种消遣。虽然小说中五龙和树生的求雨没有达成目的，但他们是全四合山中闪烁的鬼火。两人用唱歌、用闷头快跑把恐惧甩到了后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再造文明的冲动，同时又呈现出儿童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的精神向度。

书写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文本的时候，呈现了两种倾向。

“抗日红色少年传奇”：如何书写抗战儿童小说文本

■陈香

“抗日红色少年传奇”系列（三册），许诺晨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版，15.00元/册

心理、道德伦理、人人心性深入骨髓的洗礼？

显然，在书写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文本的时候，呈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就是以战争年代和“十七年”期间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为代表，如《鸡毛信》《雨来没有死》《小兵张嘎》等文本，其特点是，有“红色英雄”情结，呈现出时代生活与英雄事件的本真状态，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种就是新世纪以来的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摒弃传统历史叙述模式，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对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给以混沌多面的审视。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书写，大致都是遵循后一书写理路，从《火印》《少年夏之秋》《少年的荣耀》，到《如菊如月》《将军胡同》，都是如此，也诞生了一批佳作。然而，要在“儿童”这个方圆之内，把复杂多面的战争主

题转化为小读者可理解的叙述，无从避免生命暴力，却要把故事讲得不刺激感官却能震撼心灵，要把最强烈的仇恨和最残酷的死亡消解在温情的叙述之中，其艰难可想而知。因为战争具有彻底的“反儿童性”，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涉及血腥、凶残、苦难，而且这种民族战争中的苦难是一种撕裂开来的苦难，跟儿童文学过去所写的成长苦难完全不一样。

由此，我们发现了这种“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在部分抗战题材儿童小说文本中言说的无力。复杂、宏阔、惨烈的战争书写，必须进行，如儿童文学某些命定的规范下进行，如以儿童为本位，进入儿童生命空间，具备朴素自然的审美风格，有着“给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的使命等，战争与童年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对立，则“人文观照和人性发掘”的努力，始终有一种拘束在。当然，冲破这层镣铐，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

深刻洞察，以及思想的力量，从而在儿童文学的规范中书写震撼人心的道德伦理、人人心性的矛盾冲突。

由此，第二个问题是，对战争进行白描式的硬明、爽脆的叙事风格，是否就不值得继续继承发扬呢？文学艺术首先就应该是多元多元的，回归儿童本位，在创作中进入小主人公的生活空间，代入作者童年的想象，用白描的手法描写一个小英雄的成长历程，故事曲折，可读性强，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流畅，情真意切，且以白描手法消解小说叙事内部的一种紧张关系，我以为，也是一种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文本重要的叙事面向。当然，呼唤新世纪的“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还需要摒弃原来简单的脸谱化的叙事，努力在一个白描叙述中，呈现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对民族精神意义的深层探究。

显然，“抗日红色少年传奇”就

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气质和特色，是“小兵张嘎”和“小英雄雨来”叙事的复归。故事曲折，环环相扣，情真意切，可读性强；人物形象鲜明，一些生活化场景的描绘和写实细节为作品增加了趣味的色彩。叙事流畅，作家展现了较为高超的叙事架构能力；同时，在一个消解英雄的年代，呈现出了一种对“崇高”和“英雄”的渴望和歌颂；这种白描式的写法，把处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日常生活化了，拉近了与小读者的距离，符合他们的审美接受特点，从阅读方面而言，更有利于孩子们对这段历史的阅读和接受。尤其是，在“抗日红色少年传奇”的《小英雄雷鸣》《小英雄朱元宝》与《小英雄鲁小花》中，分别呈现出了上世纪40年代太行山下、山西朔州、上海滩的环境背景，看得出作家为还原抗战历史景象而做出的资料爬梳的努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战争中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战争中

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可能牵扯到生与死、荣与辱这些大问题，真正想把那时的人写活，需要笔者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去思考，去替那时的孩子作出人生选择。战争中的孩子也不例外。希望作家在这一方面再加以努力。在许诺晨的作品中，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阅读的愉悦感和轻盈感，这是出在物质丰富一代的作家所自然流露的文学气质，然而，文学艺术作为艺术的终极处，还是希望作家能呈现出生活生命的厚重与多义，展现出更为深厚的美学价值。当年轻一代作家回望抗战题材时，由于历史和时间的消逝，其文本往往有一种“隔”的意味，这需要我们的作家去行走，去思考，重新将自己放置在其时其人的状态下，而不是仅仅说一个故事，毕竟那是一段异常惨烈的历史。当然，许诺晨还非常年轻，她的文学事业道路还非常之长，如她现在的文学起点来看，文学之峰在等待她攀登。